

引用格式: 黄泰, 卫嫚, 席建超. 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及防控机制[J]. 资源科学, 2022, 44(9): 1932-1948. [Huang T, Wei M, Xi J C. Risk and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in underdeveloped areas[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9): 1932-1948.] DOI: 10.18402/resci.2022.09.15

# 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及防控机制

黄泰<sup>1,2</sup>, 卫嫚<sup>1</sup>, 席建超<sup>3</sup>

(1. 苏州大学旅游系, 苏州 215123; 2. 苏州大学文化与旅游发展研究院, 苏州 215123;

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有效防控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是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脆弱性评价理论和全面风险管理理论, 在构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理论框架及评价模型基础上, 以大别山天柱山旅游片区为例, 实证分析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及内在驱动防控机制。结果发现: ①欠发达旅游脱贫地区脱贫稳定性整体较高, 旅游参与型农户相对于非旅游参与型农户具有更高脱贫稳定性和更低返贫风险, 但随着旅游参与程度由低到高, 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呈现U型变化, 即高参与度农户亦会因受旅游业自身脆弱性影响而导致返贫风险反向拉升。②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影响因素包括内生性和突变性两类, 对于不同类型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而言, 两类因素的作用程度也存在差异性。③健康冲击和人力资本对返贫风险起到关键性影响作用, 并通过农户生计多样性和体现人格特质的非认知能力影响返贫风险; 返贫风险具有空间异质性, 旅游地风险防控能力和资源禀赋越高, 农户返贫风险越低。④欠发达旅游地应构建以目标管理、组织层级、风险要素为框架, 目标设定、综合管控、常态化治理、制度健全、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督为一体的返贫风险多维防控机制。本文可为中国欠发达地区返贫风险防控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 旅游脱贫; 返贫风险; 防控机制; 天柱山旅游区

DOI: 10.18402/resci.2022.09.15

## 1 引言

2020年中国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 但返贫风险依然存在, 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欠发达是相对贫困的动态反映,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定义<sup>[1,2]</sup>, 欠发达地区多是指因区位条件、历史因素和地域文化等客观条件限制, 其经济发展速度、社会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地区有一定差距的区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年)》数据显示, 欠发达连片贫困地带是返贫现象高发地, 返贫率高至20%以上。2020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表示“据各地初步摸底, 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sup>[3]</sup>。返贫风险是阻滞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

此国家层面制定了一系列的返贫防控政策。其中, 2021年11月, 《“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进一步支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2022年2月,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可见, 防控返贫风险是实现长效脱贫的基础要求, 构建欠发达地区的返贫风险防控机制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先导和必要保障。

与其他生产服务产业相比, 旅游业在减少欠发达地区的贫困方面被认为具有更大的潜力<sup>[4]</sup>。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难以支持乡村地区的进一步发展<sup>[5]</sup>, 旅游业被认为更适合无其他增长选择而旅游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农村社区<sup>[6]</sup>, 将发展旅游产业作

收稿日期: 2022-01-25 修订日期: 2022-04-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GL123)。

作者简介: 黄泰, 男, 江苏丰县人, 教授, 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旅游规划。E-mail: huangtai\_fx@163.com

通讯作者: 卫嫚, 女, 安徽合肥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与管理。E-mail: weimango@foxmail.com

2022年9月

为主要扶贫手段是其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sup>[7]</sup>,也可实现乡村农户的脱贫致富<sup>[8]</sup>。然而,由于旅游业自身的脆弱性,旅游扶贫的效用在欠发达地区脱贫实践中仍具有不均衡、不充分的表现<sup>[9]</sup>。例如,陈超凡等<sup>[10]</sup>以罗霄山片区为例,研究发现旅游扶贫效率较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脱贫致富的推动作用并不理想。徐少葵等<sup>[11]</sup>以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为例,发现旅游扶贫绩效呈逐步衰退趋势,且空间分布的极化趋势显著。何静等<sup>[12]</sup>以西南地区136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揭示了旅游扶贫脱贫的不稳定性和空间差异性。穆学青等<sup>[13]</sup>以云南25个边境县(市)为例,证实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交通、市场需求规模以及政府干预是其旅游扶贫提升的主要驱动力。从负面效应视角,谢双玉等<sup>[14]</sup>发现旅游发展增加了贫困农户经济成本,扶贫呈现出“扶强不扶弱”的现象;段伟等<sup>[15]</sup>发现生态旅游形式的自然保护区会削弱社会资本,从而导致农户多维贫困。因此,旅游脱贫后如何有效阻断返贫风险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外多基于贫困动态学与脆弱性视角,强调贫困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将返贫风险纳入贫困体系进行研究<sup>[16,17]</sup>。国内对旅游脱贫后的返贫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脱贫后的返贫成因、返贫风险评估和防控预警等内容。其中,在返贫成因上,多基于生计资本视角和突发事件等视角<sup>[18,19]</sup>,认为返贫是脱贫者内生动力不足以抵抗内外冲击的多维因素结果。在返贫风险评估上,主要以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度返贫风险<sup>[18]</sup>。在返贫风险防控预警上,学者们通常根据返贫成因提出具体防控建议和预警机制<sup>[20]</sup>。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方法为主,仅少量研究利用多维贫困综合指数<sup>[21]</sup>、层次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sup>[22]</sup>等计量方法开展研究。

综合来看,关于旅游脱贫和返贫风险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对农户返贫风险的评估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的评价方法较为单一,且缺少完善的评估框架和体系,定量测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次,针对返贫风险影响因素的识别较为简单,较少涉及中介、调节效应的探析。最后,少有研究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构建预

警和防控机制。鉴于此,本文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简称大别山片区)、天柱山红色生态旅游区(简称天柱山旅游区)为案例地,基于脆弱性的贫困测度理论,构建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评估框架测度脱贫农户返贫风险数值,通过熵值法、BP-DEMA-TEL法、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等对主要返贫风险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并引入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揭示返贫风险影响机理,以此构建返贫风险防控机制。本文立足于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启示,对巩固旅游脱贫成效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2.1 理论基础

国内外对于返贫风险的测度多基于脆弱性的贫困测度理论框架,即从前瞻性的视角通过当期可观测到的变量来预测个人或家庭未来的收入或消费水平,进而识别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能够对返贫风险进行提前预测并采取干预措施。脆弱性是指在风险冲击下,个人或家庭未来福利下降到社会公认水平下的可能性<sup>[23]</sup>。将脆弱性引入到返贫风险领域中,可以通过量化脆弱性来评估脱贫家庭未来再次陷入贫困的概率<sup>[24-27]</sup>。因此,本文基于脆弱性的贫困测度理论,构建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评估框架及返贫风险防控机理。在脆弱性量化方法中,预期贫困的脆弱性模型(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 VEP)不仅解决了面板数据和高频数据获取的难度,而且允许事先测量脆弱性水平,本文采用该方法来测算返贫风险数值。借鉴以往研究<sup>[28,29]</sup>成果和经验,依据测度的返贫风险数值,以0.5为阈值,将农户家庭状态划分为脆弱性脱贫家庭和稳定性脱贫家庭,即在下一个时期有50%的概率陷入贫困时,该农户或家庭具有脆弱性。

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强调从整体入手,注重全面管理和全过程管理<sup>[30]</sup>,能够被拓展和应用于返贫风险防控及乡村振兴的理论支持。因此,本文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对返贫风险防控的环节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构建“脱贫对象类别细分—返贫风险测度—返贫风险响应—不返贫—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动态监测”的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

防控理论框架(图1):①脱贫对象类别细分。根据黎洁等<sup>[31]</sup>学者的划分方式,本文按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将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划分为3类:  $0% < \text{旅游兼营型} < 40\%$ 、 $40\% \leq \text{旅游主导型} < 80\%$ 、 $80\% \leq \text{旅游专营型} \leq 100\%$ 。②返贫风险测度,即警度判断,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返贫风险测度和分级。③返贫风险响应,包括警源分析和风险应对。警源分析核心在于返贫风险机理的剖析,在返贫致因的研究中<sup>[18,19]</sup>,普遍认为生计资本能使家庭保持长期脱贫稳定性,突变事件能使家庭陷入瞬时贫困状态,因此将生计资本列为内生性影响因素,将突变事故列为突变性影响因素。为了探究两类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深层次关系以便采取更为具体的防控措施,本文从主客体视角选取变量进行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分析。④不返贫—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动态监测。在进行返贫风险响应后,致力于不返贫的防控目标,促进乡村旅游地可持续

发展,并以动态监测为基准,形成旅游地返贫风险循环防控。

## 2.2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参考既往研究成果,本文选取4类生计资本作为内生性因子、7类风险冲击作为突变性因子来分析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表1)。具体来讲,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5种类型<sup>[32]</sup>,由于金融资本构成的家庭总收入被直接用作返贫风险测度,因此本文将其他4类生计资本列为内生性因子。突变性因子主要包括各类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经实地调研,天柱山旅游区内脱贫农户主要受到健康、教育、消费、就业、政策、市场需求、公共卫生风险冲击影响。

旅游地返贫风险不仅受到影响因素的直接影响,还包含有复杂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因此,本文从主体视角选取生计多样性和非认知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农户生计多样性反映了其收入来源及其稳定性<sup>[33]</sup>,是生计策略的一种表现形式。生计资本是生计来源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sup>[34]</sup>,生计资本的缺乏限制了当地农户生计的多样性<sup>[35]</sup>。风险冲击影响家庭生计策略的选择<sup>[36]</sup>,生计策略的多样性能减少某种突变性风险冲击带来的经济损失<sup>[37]</sup>。非认知能力是一种人格特质,指情感、意志、性格和动机等,通常使用“大五人格”模型测度<sup>[38]</sup>。非认知能力对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sup>[38]</sup>,负向影响农户的相对贫困状态<sup>[39]</sup>。同时,非认知能力也受到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sup>[40]</sup>,而风险冲击易造成家庭负面消极的非认知能力<sup>[41]</sup>,使家庭丧失脱贫主动性,形成脱贫家庭被动接受风险冲击状况。

从客体视角选取旅游地防控能力和旅游地资源禀赋作为调节变量。旅游地风险防控能够有效控制贫困<sup>[42]</sup>,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机制和及时有效的帮扶措施对防止返贫至关重要。旅游地资源禀赋对旅游参与型农户脱贫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通常旅游资源越丰富旅游业越发达,农户旅游收入越高<sup>[43]</sup>,返贫风险越低。调节变量按14个乡村进行地区分级,低于平均水平的乡村定义为0,高于平均水平的乡村定义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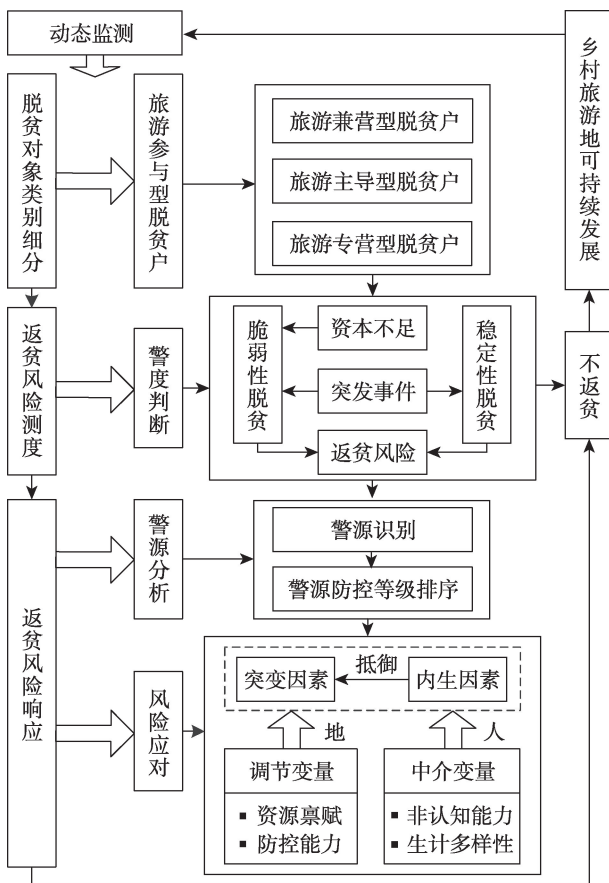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防控理论框架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2022年9月

表1 变量选取及赋值

Table 1 Variable selection and assignment

维度	指标	变量	变量赋值	性质
内生性返贫风险影响因素	自然资本	人均园地面积	<5亩=1;5~10亩(不含)=2;10~15亩(不含)=3;15~20亩(不含)=4;≥20亩=5	+
		人均发展旅游园地面积	<5亩=1;5~10亩(不含)=2;10~15亩(不含)=3;15~20亩(不含)=4;≥20亩=5	+
		家庭区位	距离主要公路的远近:非常远=1;较远=2;一般=3;较近=4;非常近=5	+
	物质资本	房屋情况	房屋类型:土木房=1;砖木房=2;砖混房=3;混凝土房=4	+
			房屋面积: <100 m <sup>2</sup> =1;100~200 m <sup>2</sup> (不含)=2;200~400 m <sup>2</sup> (不含)=3;≥400 m <sup>2</sup> =4	+
		经营性物质资产	经营面积: <10 m <sup>2</sup> =1;10~50 m <sup>2</sup> (不含)=2;50~100 m <sup>2</sup> (不含)=3;≥100 m <sup>2</sup> =4	+
	社会资本	家庭固定资产/种	家庭拥有电饭煲、电视机、冰箱、组合家具、手机、空调、太阳能热水器、电脑、天然气灶、洗衣机、汽车、农用三轮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和拖拉机种类	+
		参加社会组织	是否参加社区组织(合作社、乡村旅游相关协会等):无=0;有=1	+
		社会连接度	家庭成员是否有国家公职人员、村干部等:无=0;有=1	+
	人力资本	专业技能培训机会	是否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无=0;有=1	+
		专业技能	家庭成员最高技能:无任何技能=1;具备简单技能=2;具备中等技能=3;具备高等技能=4	+
		家庭旅游从业情况	家庭旅游业就业人数/家庭总人口数	+
		家庭健康状况	家庭未患大病或慢性病人口数/家庭总人口数	+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成年人口受教育年限之和/成年人口数	+
突发性返贫风险影响因素	健康冲击	大病冲击	大病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程度,五点量表:低=1;高=5	+
	教育冲击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五点量表:低=1;高=5	+
	消费冲击	婚丧嫁娶支出	婚丧嫁娶支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五点量表:低=1;高=5	+
	就业冲击	外出务工收入损失	外出务工性失业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程度,五点量表:低=1;高=5	+
	政策冲击	旅游扶贫政策变动	旅游扶贫政策变动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程度,五点量表:低=1;高=5	+
	市场需求冲击	游客需求转移	游客量不稳定性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程度,五点量表:低=1;高=5	+
	公共卫生冲击	新冠疫情冲击	新冠疫情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程度,五点量表:低=1;高=5	+
中介变量	生计多样性	收入来源种类/种	收入来源种类	+
	非认知能力	情绪稳定	一周内精神紧张的次数—一周内做任何事情都感到费力的次数	-
			一周内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的次数	-
		外向性	调查者对被调查者待人接物的评价,五点量表:差=1;好=5	+
		思维开通性	对调查的兴趣,五点量表:不感兴趣=1;感兴趣=5	+
		宜人性	其他居民对被调查者乐于助人的评价,五点量表:低=1;高=5	+
			其他居民对被调查者人缘的评价,五点量表:差=1;好=5	+
		尽责性	对问卷题目的疑问,五点量表:少=1,多=5	+
			调查者对被调查者衣物整洁程度的评价,五点量表:不整洁=1;整洁=5	+
	调节变量	风险防控能力	旅游政策支持度	+
调节变量	风险防控能力	社区领导力	对乡村管理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感知,五点量表:低=1;高=5	+
		旅游地资源禀赋	调查者对旅游地与主景区距离实地调研判断:远=0;近=1	+
	旅游地资源禀赋	当地旅游资源吸引力	调查者对旅游地旅游资源吸引力实地调研判断以及旅游者、专家学者的评价,低=0;高=1	+
		旅游基础设施	调查者对旅游地旅游基础设施实地调研判断以及旅游者、专家学者的评价,差=0;好=1	+

## 2.3 研究方法

### 2.3.1 影响因素处理模型

#### (1) 熵值法

通过熵值法<sup>[35]</sup>确定内生性影响因素、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等各指标综合数值。具体公式如下:

$$p_{vl} = \frac{a_{vl}}{\sum_{v=1}^m a_{vl}} \quad (1)$$

$$f_l = \frac{\sum_{v=1}^m (p_{vl} \ln p_{vl})}{\ln m} \quad (2)$$

$$g_l = 1 - f_l \quad (3)$$

$$q_l = \frac{g_l}{\sum_{l=1}^m g_l} \quad (4)$$

$$O_v = \sum_{l=1}^m q_l a_{vl} \quad (5)$$

式中:  $p_{vl}$  为第  $v$  项指标在第  $l$  项指标下所占的比重;  $a_{vl}$  为标准化数值;  $m$  为样本个数;  $f_l$  为第  $l$  项指标的熵值;  $g_l$  为第  $l$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q_l$  为第  $l$  项指标的权重;  $O_v$  为第  $v$  个内生性影响因素、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综合评价价值。

#### (2) BP-DEMATEL 模型

采用 DEMATEL 方法<sup>[44]</sup>进行突变因素探索,并引入 BP 神经网络方法<sup>[45]</sup>进行改进。具体公式如下:

$$\omega = \text{mean}(|W| \times |w|) \quad (6)$$

$$A_{ij} = \omega_i / \omega_j \quad (7)$$

$$A = (A_{ij})_{n \times n} \quad (8)$$

$$X = S \times A \quad (9)$$

$$Z = X(I - X)^{-1} \quad (10)$$

$$D_i = Z_{i1} + Z_{i2} \dots + Z_{in} \quad (11)$$

$$H_j = Z_{1j} + Z_{2j} \dots + Z_{nj} \quad (12)$$

$$C_i = D_i + H_j \quad (13)$$

式中:  $\omega$  为权重向量;  $W$  为输入层与中间层的权重矩阵;  $w$  为中间层与输出层的权重矩阵;  $|W|$ 、 $|w|$  表示矩阵中的每个元素都取绝对值;  $\text{mean}$  函数代表的意思是如果  $|W| \times |w|$  计算后的行数大于 1, 则对  $|W| \times |w|$  每列计算结果取平均值;  $\omega_i$ 、 $\omega_j$  分别为  $\omega$  中的第  $i$  个元素和第  $j$  个元素;  $A_{ij}$  为  $i$  影响因素对

$j$  影响因素的影响作用;  $A$  为直接影响矩阵;  $X$  为直接影响矩阵  $A$  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矩阵;  $S$  为直接影响矩阵各行求和最大值的倒数;  $Z$  为综合影响矩阵;  $I$  为单位矩阵;  $(I - X)^{-1}$  为  $(I - X)$  的逆矩阵;  $Z_{ij}$  为  $Z$  中第  $i$  行第  $j$  列的元素;  $D_i$  为因素影响度;  $H_j$  为因素被影响度;  $C_i$  为因素中心度。

### 2.3.2 返贫风险评价模型

根据脆弱性的贫困测度理论框架,结合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sup>[23]</sup>进行返贫风险测度。具体公式如下:

$$\ln c_{b,t} = \beta_t B_{b,t} + e_b \quad (14)$$

$$\hat{V}[\ln c_{b,t+1} | B_{b,t}] = \sigma_{e,b}^2 = \hat{\theta} B_{b,t} \quad (15)$$

$$\hat{E}[\ln c_{b,t+1} | B_{b,t}] = \hat{\beta} B_{b,t} \quad (16)$$

$$\widehat{VEP}_{b,t}(\ln c_{b,t+1} < \ln z | B_{b,t}) = \Phi\left(\frac{\ln z - \hat{\beta} B_{b,t}}{\sqrt{\hat{\theta} B_{b,t}}}\right) \quad (17)$$

式中:  $c_{b,t}$  为家庭  $b$  在  $t$  期的人均收入;  $B_{b,t}$  为一列家庭或户主特征变量,选取家庭特征变量为劳动力水平、家庭成员疾病比例、儿童比例、资产、成年人平均年龄、成年人平均年龄平方、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选取户主变量为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  $\beta_t$  为参数向量;  $e_b$  为残差项;  $\hat{V}$ 、 $\sigma_{e,b}^2$  为家庭  $b$  在  $t+1$  期人均收入对数的方差;  $\hat{E}$  为家庭  $b$  在  $t+1$  期人均收入对数的期望;  $\hat{\theta}$ 、 $\hat{\beta}$  为估计变量系数;  $\widehat{VEP}_{b,t}$  为家庭  $b$  在  $t$  时期返贫风险指数,数值越大,返贫风险越大;  $z$  为相对贫困监测线。相对贫困监测线的划定并无统一标准,国外发达国家选取上一年度全国家庭平均收入中位数的 60% 左右或以人口比例 10%~15% 为贫困标准<sup>[46]</sup>,国内浙江省 2013 年设定的相对贫困标准是 4600 元,江苏省 2015 年以地区人均收入的中位数 6000 元为相对贫困标准,广东省 2019 年将相对贫困人口比例提高至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5%,本文结合案例地经济发展实际,以 2020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567 元的 40%,即 6227 元为相对贫困监测线。

### 2.3.3 返贫风险影响因素回归模型

根据返贫风险测度结果,将脱贫农户分为“脆弱性脱贫户”和“稳定性脱贫户”两类,为典型二值

2022年9月

变量,适合使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sup>[47]</sup>。具体公式如下:

$$\rho_r = \frac{1}{1 + e^{-\left(\alpha + \sum_{r=1}^y \mu_r x_r\right)}} = \frac{e^{\alpha + \sum_{r=1}^y \mu_r x_r}}{1 + e^{\alpha + \sum_{r=1}^y \mu_r x_r}} \quad (18)$$

$$\ln\left(\frac{\rho_r}{1 - \rho_r}\right) = \alpha_0 + \sum_{r=1}^y \mu_r x_r \quad (19)$$

式中:  $y$  为解释变量类别;当  $y=1$  时,  $\rho_r$  为脆弱性脱贫农户返贫风险概率,当  $y=0$  时,  $1 - \rho_r$  为稳定性脱贫农户返贫风险概率;  $x_r$  为第  $r$  个自变量标准化数值;  $\alpha$ 、 $\alpha_0$  为常数项;  $\mu_r$  为解释变量的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对脱贫农户为脆弱性脱贫户的影响方向及程度。

###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3.1 研究区概况

大别山片区自然、生态以及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缓慢,仍处于欠发达状态。天柱山旅游区地处大别山片区腹地,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西南部,大别山南麓(图2),其辐射范围主要包含潜山市域内的天柱山镇和水吼镇,共计20个行政村。实地调查和走访发现天柱山镇内茶庄村、天寺村、白水村、风景村、林庄村以及水吼镇内水吼村、马潭村、黄龛村、梅寨村、高峰村、驾雾村、割肚村、和平村、天柱村14个村的旅游扶贫带动效应显著,因此,本文选择这14个村为案例地和

采样点,实证探究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及防控机制。研究区所在潜山市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大别山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重点区域,域内有天柱山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以及一系列的生态和文化旅游资源,探索出了以景区带动为主,产业扶贫、结对帮扶和自主开发相结合的旅游扶贫路径,2020年实现全域脱贫,旅游脱贫特征显著。因此,本文以天柱山旅游区为案例地,研究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及防控机制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 3.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由课题组于2021年8月对案例地脱贫农户的实地入户调研所得。首先,从县、镇、村三级层面收集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的统计资料;其次,对大别山片区部分旅游扶贫重点村进行返贫致因访谈和调查问卷预调研;最后,正式进行天柱山旅游区脱贫农户入户调研。调查问卷包括3个部分:①家庭人口基本信息,包括被访者个人或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②脱贫农户基本情况,包括家庭参与旅游程度、生计资本、生计多样性、非认知能力等;③脱贫农户损失和感知程度,包括家庭受突变事件冲击导致的财产损失程度,对乡村风险防控能力、乡村旅游资源禀赋等感知程度,均采用李克特量表5级尺度进行量化。调查共获得590份有效调查问卷,经过筛选共计获得572份农户有效调查问卷,问卷有效率96.95%。其中非旅游参与型133份,旅游参与型439份。调查问卷信效度和信度均满足研究标准。

### 4 结果与分析

#### 4.1 返贫风险测度

根据返贫风险评价模型,得到农户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值,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均值为0.3125,非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均值为0.3408,表明旅游参与型农户返贫风险更低,旅游发展可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脱贫稳定性。将返贫风险的测度结果进行警度分级,从低到高划分为5类:  $0.5 \leq I < 0.6$ 、 $0.6 \leq II < 0.7$ 、 $0.7 \leq III < 0.8$ 、 $0.8 \leq IV < 0.9$ 、 $0.9 \leq V \leq 1$ 。结果表明,在总样本人口中,I~IV类群体占比较小,在返贫边缘的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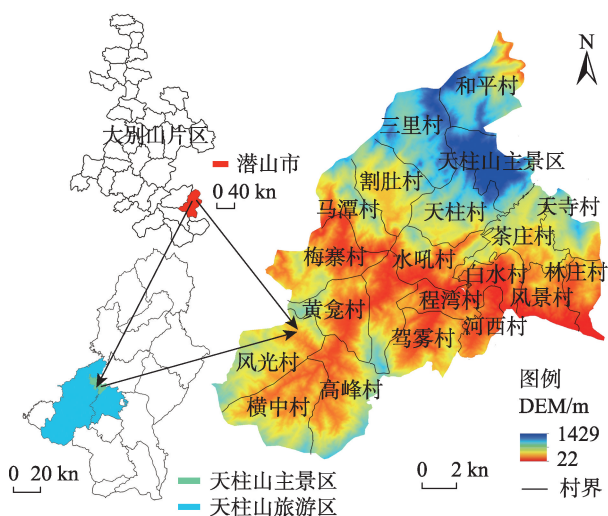


图2 天柱山红色生态旅游区区位图

Figure 2 Location of the Tianzhu Mountain Red Eco-tourism Area

表2 家庭特征维度下返贫风险差异性

Table 2 Differences in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considering family characteristics

变量	特征分类	非旅游参与型	旅游参与型		
			旅游兼营型	旅游主导型	旅游专营型
家庭成年人平均年龄/岁	<40	0.2034	0.4888	0.4634	0.4955
	[40, 50)	0.0461	0.0570	0.1359	0.0489
	[50, 60)	0.2044	0.1773	0.2276	0.2281
	≥ 60	0.9313	0.6362	0.5543	0.7379
家庭疾病率/%	<25	0.1962	0.1894	0.1582	0.1358
	[25, 50)	0.1463	0.3021	0.2524	0.3743
	[50, 75)	0.4117	0.3872	0.3838	0.3873
	≥ 75	0.8524	0.6697	0.4310	0.5944
家庭劳动力水平/%	<25	0.9326	0.7429	0.6625	0.8478
	[25, 50)	0.1121	0.3299	0.3740	0.4838
	[50, 75)	0.0022	0.1681	0.1404	0.2321
	≥ 75	0.0884	0.0605	0.0866	0.0671
总体	—	0.3408	0.3229	0.2820	0.3374

类群体占比较大,达21.83%,这说明研究区域内相当数量脱贫农户极易发生返贫,欠发达旅游地亟需采用防控措施减缓和阻断返贫风险。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旅游参与程度下的返贫风险差异,本文从家庭特征维度对返贫风险进行分解。首先,旅游脱贫方式明显降低弱势群体返贫风险。当家庭特征分别为家庭成年人平均年龄超过60岁、家庭疾病率超过75%和家庭劳动力水平不足25%时,各类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返贫风险数值均低于非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其次,返贫风险随旅游参与程度呈现U型趋势。旅游主导型农户的返贫风险在各维度下总体最低,说明旅游参与达到一定程度时具有明显的脱贫成效。但由于新冠疫情对旅游产业影响较高,旅游专营型农户旅游参与程度达到80%,家庭收入和游客量直接相关,因此返贫风险有所升高。

## 4.2 返贫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 4.2.1 回归结果分析

突变性影响因素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不能直接进行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因此,在进行影响因素的检验之前,需要对突变性因素进行强驱动因素<sup>[44]</sup>的提取。本文通过BP-DEMATEL模型测度影响因素的中心度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和,并将其作为阈值,大于该阈值的影响因素即为强驱动因素。经

计算得出,旅游兼营型脱贫农户强驱动因素阈值为3.497,就业冲击和健康冲击是其强驱动因素;旅游主导型脱贫农户阈值为3.718,健康冲击、市场需求冲击和公共卫生冲击是其强驱动因素;旅游专营型脱贫农户阈值为4.098,市场需求冲击、公共卫生冲击和健康冲击是其强驱动因素(表3)。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各影响因素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4),进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警源识别,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健康冲击对返贫风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欠发达地区医疗保障能力较弱,因病返贫问题有很大可能发生。其次,人力资本对返贫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人力资本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对比发现,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返贫风险的负向影响程度均较小,很

表3 脱贫农户风险冲击中心度

Table 3 Centrality of the impact of risk factors of farming households

变量	旅游兼营型	旅游主导型	旅游专营型
健康冲击	3.622	4.122	4.235
教育冲击	3.373	3.502	4.002
消费冲击	3.493	3.420	3.951
就业冲击	3.653	3.531	3.842
政策冲击	3.435	3.607	3.899
市场需求冲击	3.345	4.031	4.396
公共卫生冲击	3.456	3.815	4.362

2022年9月

表4 返贫风险影响因素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one-way ANOVA f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指标	旅游兼营型	旅游主导型	旅游专营型
自然资本	1.62**	2.13***	2.55***
物质资本	4.03***	2.12***	4.13***
社会资本	7.90***	2.48**	3.82***
人力资本	5.09***	4.23***	2.87*
健康冲击	34.72***	20.07***	27.02***
就业冲击	33.70***	—	—
公共卫生冲击	—	7.15***	2.93*
市场需求冲击	—	15.70***	6.55***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表5 回归估计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指标	旅游兼营型	旅游主导型	旅游专营型
自然资本	-0.7194* (0.3703)	-0.7890* (0.4148)	-0.9227** (0.3936)
物质资本	-0.5799** (0.2911)	-0.6491* (0.3600)	-0.6188* (0.3296)
社会资本	-0.5671** (0.2623)	-0.4945** (0.2332)	-0.4010** (0.1816)
人力资本	-1.0761** (0.4157)	-1.2304*** (0.3584)	-0.6489* (0.3605)
健康冲击	1.1980*** (0.3843)	0.9492** (0.4104)	1.0933** (0.4746)
就业冲击	0.7421* (0.4008)	—	—
公共卫生冲击	—	0.8535* (0.5135)	0.9148* (0.4720)
市场需求冲击	—	0.3665	-0.0893

大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体现的是脱贫家庭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现有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脱贫家庭的借贷和资产变现能力,其在短时间内能阻滞返贫风险的发生,但不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最后,对旅游兼营农户来说,家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策略选择,因此就业冲击对返贫风险具有较强正向影响。对旅游主导型和旅游专营型农户来说,家庭以旅游参与为主要生计策略选择,自然资本对返贫风险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公共卫生冲击则对返贫风险的降低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当家庭拥有发展旅游的观光采摘园地面积更多、离主要旅游景点更近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旅游收益。同时,旅游产业具有规模性、流动性和社交性等特性,对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高敏感

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会直接阻断游客的出行,进而引发农户旅游收入的断崖式下降。

#### 4.2.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二元Logistics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更换模型和改变影响因素指标合成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方法。①更换模型为二元Probit模型。②改变影响因素指标合成方法为BP神经网络方法。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排序以及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回归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 4.3 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分析

##### 4.3.1 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各影响因素对返贫风险的间接传导机制,需要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由于因变量、中介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故本文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检验影响因素的中介效应(表6)。总体上,生计多样性和非认知能力两类因素对返贫风险的影响中虽然存在少数无中介效应或中介效应不足15%的情况,但多数中介效应高于15%,说明生计多样性和非认知能力对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显著,即生计资本和风险冲击可以通过生计多样性和非认知能力间接降低返贫风险。一方面,生计多样性是脱贫农户抵御返贫风险的适应行为,体现的是脱贫农户整合家庭生计资本的能力,生计多样性越高说明脱贫家庭具有多元生计来源,抵御突变事件的能力越强。另一方面,在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中,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被印证。非认知能力体现了劳动者在工作中保持情绪稳定、责任心、开放性、乐于助人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在认知能力欠缺时,非认知能力能够帮助劳动者在工作中提升收入水平<sup>[48]</sup>。对于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来说,其与游客直接接触的概率极高,非认知能力越高的脱贫农户越能以独特的人格特征吸引和二次吸引游客,产生现实和未来的旅游经济收入,扩展同一生计资本水平下的收入优势,表现出更高的收入溢价。同时,非认知能力越高的脱贫农户对突发事件的预判、应对更加从容,可以选择合适的措施应对风险冲击。最后,结果显示生计多样性的中介效应占比为5.96%~39.30%,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9.27%~60.03%,说明相比于生计多样性,非认知能力对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在多数

表6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6 Mediation effect test

中介作用	旅游兼营型		旅游主导型		旅游专营型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比/%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比/%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比/%
自然资本→ 生计多样性	-0.0215	—	-0.0339**(0.0158)	22.14	-0.0325**(0.0146)	17.49
物质资本→ 生计多样性	-0.0301*** (0.0112)	20.53	-0.0227(0.0154)	17.15	-0.0249	—
社会资本→ 生计多样性	-0.0341*** (0.0121)	19.46	-0.0268** (0.0125)	39.30	-0.0306*** (0.0118)	25.48
人力资本→ 生计多样性	-0.0515*** (0.0189)	20.74	-0.0309** (0.0143)	13.38	-0.0168	—
健康冲击→ 生计多样性	0.0515*** (0.0175)	18.07	0.0383** (0.0178)	16.18	0.0603*** (0.0216)	18.62
就业冲击→ 生计多样性	0.0539*** (0.0175)	18.66	—	—	—	—
公共卫生冲击→ 生计多样性	—	—	0.0430** (0.0201)	17.88	0.0111847	5.96
自然资本→ 非认知能力	-0.0913*** (0.0264)	55.64	-0.0595*** (0.0214)	38.86	-0.0650*** (0.0214)	34.98
物质资本→ 非认知能力	-0.0553*** (0.0156)	37.72	-0.0224	—	-0.0799*** (0.0234)	60.03
社会资本→ 非认知能力	-0.0744*** (0.0172)	42.47	-0.0228	—	-0.0665*** (0.0171)	55.37
人力资本→ 非认知能力	-0.1073*** (0.0266)	43.21	-0.0813*** (0.0195)	35.21	-0.1248*** (0.0306)	51.27
健康冲击→ 非认知能力	0.1017*** (0.0243)	35.69	0.0714*** (0.0242)	30.16	0.1865*** (0.0358)	57.58
就业冲击→ 非认知能力	0.0899*** (0.0236)	31.13	—	—	—	—
公共卫生冲击→ 非认知能力	—	—	0.0704** (0.0274)	29.27	0.1046*** (0.0355)	55.73

情况下更为显著。这是因为非认知能力更具延展性,表现为内在的心理资本,而生计多样性则会因为家庭生计资本的变化和突变事故的发生产生显著变化。因此,非认知能力的表现较为稳定,是旅游参与型脱贫家庭摆脱相对贫困的重要内生动力。

#### 4.3.2 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探究影响因素对返贫风险的空间异质性,需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为此,本文将影响因素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引入到二元Logistics模型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首先,除旅游地资源禀赋对旅游兼营型家庭人力资本因素、对旅游主导型家庭社会资本因素2项检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风险防控能力和旅游地资源禀赋对其余因素的调节效应均通过了1%~10%的显著性检验,且具有

显著的调节效应。其中,风险防控能力体现了当地返贫风险的日常监测、评价和管理,以及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可以降低风险防控成本,减少因风险带来的损失,从而促进脱贫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发展,减少返贫现象的发生。对旅游产业为主导性产业的欠发达地区而言,旅游资源禀赋对返贫风险的降低具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旅游资源价值越高、旅游基础设施越完善、离主景区距离越近时,旅游产品业态会越丰富、游客量越多。其次,对旅游主导型和旅游专营型农户来说,风险防控能力和旅游地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系数较高,调节效应更为明显。这是由于对于旅游兼营型脱贫农户来说,旅游参与形式多为旺季时临时摆摊、景区临时工等,旅游淡季时外出务工,旅游业不是其主要生计来源,

2022年9月

表7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Test results of regulatory effects

调节效应	旅游兼营型	旅游主导型	旅游专营型	调节效应	旅游兼营型	旅游主导型	旅游专营型
风险防控能力× 自然资本	-0.5303*** (0.1905)	-1.0897*** (0.2936)	-0.8225*** (0.2564)	旅游地资源禀赋× 自然资本	-0.3026* (0.1806)	-0.4048* (0.2091)	-0.6234*** (0.2266)
风险防控能力× 物质资本	-0.6294*** (0.2186)	-0.9926*** (0.2719)	-0.8864*** (0.2713)	旅游地资源禀赋× 物质资本	-0.4038** (0.1998)	-0.3993* (0.2130)	-0.6080** (0.2344)
风险防控能力× 社会资本	-0.5257*** (0.2019)	-0.8141*** (0.2183)	0.6841*** (0.2359)	旅游地资源禀赋× 社会资本	-0.3500* (0.1951)	-0.2703 (0.1680)	0.5987*** (0.2217)
风险防控能力× 人力资本	-0.5616*** (0.1945)	-1.0671*** (0.2898)	-0.8626*** (0.2618)	旅游地资源禀赋× 人力资本	-0.2780 (0.1794)	-0.4936** (0.2078)	-0.6631*** (0.2406)
风险防控能力× 健康冲击	-0.3920*** (0.1407)	-0.7123*** (0.1886)	-0.5861*** (0.1722)	旅游地资源禀赋× 健康冲击	-0.2381* (0.1335)	-0.3045** (0.1418)	-0.5880*** (0.1858)
风险防控能力× 就业冲击	-0.4238*** (0.1438)	—	—	旅游地资源禀赋× 就业冲击	0.2412* (0.1358)	—	—
风险防控能力× 公共卫生冲击	—	-0.7156*** (0.1877)	-0.6004*** (0.1814)	旅游地资源禀赋× 公共卫生冲击	—	-0.3423** (0.1407)	-0.5982*** (0.1945)

因而旅游资源禀赋对其返贫风险的调节作用较低。此外,因旅游兼营型农户生计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在当地从事旅游生产活动的时间较少,政府的风险防控能力对其调节作用也较低。最后,除个别因素外,风险防控能力的调节效应系数高于旅游地资源禀赋,调节效应更强。原因在于旅游地资源禀赋是具有固定性和不可移动性,在较短时间内无法产生显著变化,因而其对脱贫风险的调节作用在较短时间内也无法发生显著变化,而风险防控能力则具有灵活性,可以短时间内提升脱贫农户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是脱贫农户防止返贫发生的重要防线。

#### 4.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采用更换模型和改变因素指标合成方法。①更换模型,更换中介效应模型为Bootstrap模型,更换调节效应为二元Probit模型。②改变影响因素指标合成方法为BP神经网络方法,包括仅改变内生性影响因素、仅改变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及二者均改变的3种类型指标合成方法。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以及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表明所进行的上述分析是稳健的。

## 5 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防控机制

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强调全面管理和全过程管理<sup>[30]</sup>,能够被拓展和应用于返贫风险防控及乡村振兴的理论支持,其理论框架主要包含组织层级、目

标管理和风险要素3个维度。因此,在测度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3个维度,构建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防控机制(图3)。在目标管理维度构建为返贫风险防控目标设定机制;组织层级维度构建返贫风险综合管控机制;进一步地,将风险要素维度划分为2类:一类是核心要素层级,构建返贫风险常态化治理机制;另一类为基础要素层级,构建返贫风险防控制度健全、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督的综合保障机制。

### 5.1 返贫风险防控目标设定机制

防控目标的设定是防控机制构建和实施的先导,后脱贫时代应关注远景目标和最低目标的有机衔接。因此,欠发达地区返贫风险防控应以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为远景目标,以阻绝贫困的再发生为最低目标,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基本导向,构建起一个清晰、多层次的返贫风险防控目标设定机制。具体来讲,各级政府应逐层分解目标,以乡村旅游地为基本单位设定返贫风险常态化相对贫困监测线,根据各地区旅游资源、交通区位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状,设置区域返贫控制线,同时动态及时调整更高层级的远景目标。

### 5.2 返贫风险防控综合管控机制

返贫风险防控涉及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多元价值主体。因此,应构建起一个多元主体联动、权责分明的综合管控机制。在统一的管理组织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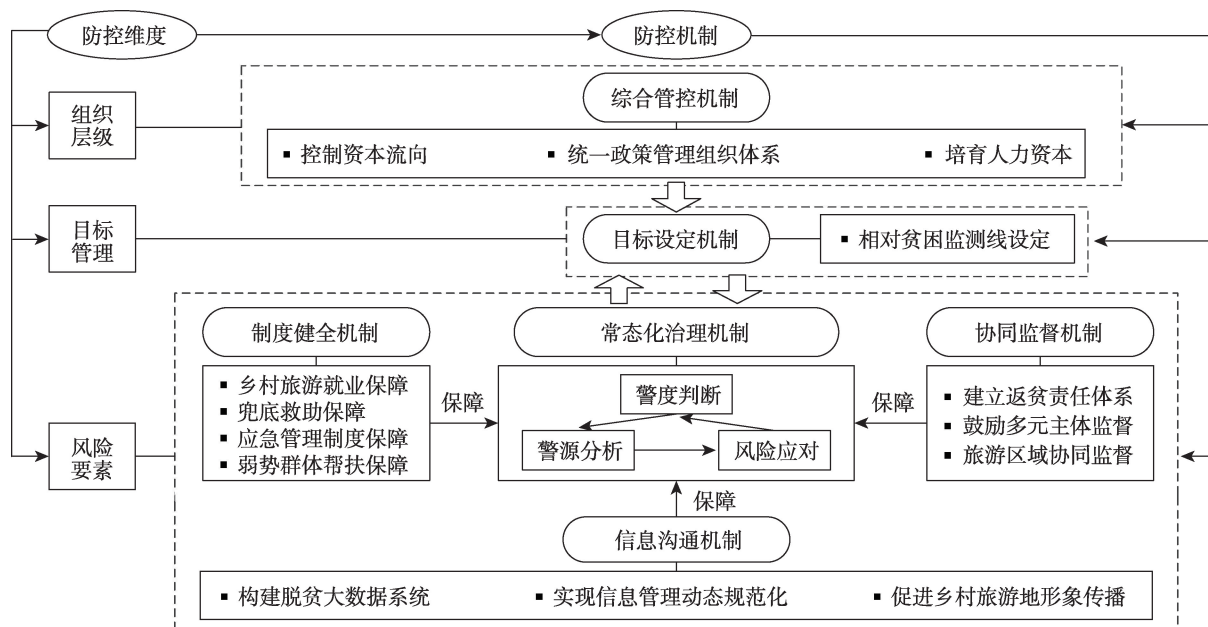


图3 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防控机制

Figure 3 Mechanism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returning to poverty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系下,引导旅游企业的经营性资本向脱贫农户倾斜,增强农户参与旅游和抵御风险的基本能力,形成多元立体的返贫风险防控综合管控机制。①统一政策管理组织体系。返贫风险防控组织体系应延续脱贫攻坚时期,保持统一的政策管理组织体系。一方面,设旅游脱贫返贫风险防控中心,将相关信息进行层层上报。另一方面,完善欠发达乡村旅游地基层服务体系,尤其是完善村干部选拔机制,乡村旅游地干部应有旅游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够评选出适宜本地脱贫群众发展的旅游项目。②引导旅游资本流向。当前脱贫农户以小商品售卖、旅游企业临时工作等形式获取仅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本与本身拥有高资本家庭在旅游发展中获取更高额经济利益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加重了矛盾冲突,使得脱贫农户丧失旅游参与和发展的意愿。乡村旅游地经营企业应给予本地居民参与旅游的实质性鼓励和资金支持,并树立旅游脱贫精英典范以推动脱贫农户建立脱贫致富信心。③培育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欠发达乡村旅游地返贫风险重要影响因素,对风险抵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首先,提供精准旅游就业服务,准确掌握脱贫人口就业意愿和需求。其次,加强脱贫农户的职业培训,针对性地进行经营管理、接待礼仪、传统技艺、导游解

说、旅游产品设计等旅游技能培训。

### 5.3 返贫风险制度健全机制

返贫风险的抵御有赖于多方面的综合保障和应急管理制度的建立。因此,防范欠发达地区返贫风险需建立起集就业保障、兜底救助、弱势群体帮扶以及应急管理于一体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体系。①乡村旅游就业保障。鼓励当地旅游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脱贫人口就业,并依托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带贫能力,利用公益岗位提供就近就地就业机会;同时支持脱贫农户自主创业开办农家乐、工艺品店和农产品店等,落实税费减免、场地安排、创业贷款和贴息等政策。②兜底救助保障。首先应以分类施保、渐退帮扶的思路做好基本生活和就业兜底工作。二是要改善兜底保障制度流程,及时准确摸排可能发生的返贫风险,建立健全防范返贫的基础性兜底制度。三是要建立旅游发展红利的兜底机制,划定最低旅游红利或分成标准,鼓励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地的建设和发展。③弱势群体帮扶保障。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地普遍存在留守、灵活就业、外来务工、未参保失业等相对弱势群体,乡村旅游地政府对其进行动态监测,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帮扶、指导和规划,引导和鼓励弱势群体力所能及、灵活地参与多元化旅游经营、旅游

2022年9月

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等工作。④应急管理。旅游产业固有脆弱性,诸如山体滑坡、洪水暴发、地震海啸等不可抗力以及社会治安、游客居民冲突等紧急事件的发生均会造成旅游者目的地的空间转移,这对欠发达旅游地的影响更为严重,将直接造成乡村旅游地经济收益骤减,引致突发返贫困境。因此,欠发达地区应着力建立起应急事件的预警、防控和解决的全过程解决机制,在不可抗力或社会不良事件发生后,及时关注舆情变化,妥善处理游客和社区居民的合理诉求,以增强应急管理的韧性。

#### 5.4 返贫风险防控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化和数字化是提升返贫防控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欠发达地区旅游地应推进脱贫大数据系统的建设,从而实施及时有效的预警和干预措施,同时可依托互联网促进旅游地形象传播,增强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地吸引力。①构建脱贫大数据系统。依托和延续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构建层层分级的脱贫农户动态管理数据库。乡村旅游地大数据平台对返贫风险全面预判与评估,对脱贫农户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实现返贫风险动态识别和精准帮扶;将可公开数据整合,包括脱贫农户自主经营的农家乐、手工艺品店、水果蔬菜采摘园和农副产品售卖等信息,促进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就业结构高质量升级。②实现信息管理动态规范化,脱贫风险的监测与管理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尽管旅游脆弱型家庭当期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之上,但其家庭会随着时间缓慢坠入相对贫困陷阱,各级控制中心要定期开展返贫风险调查。③促进乡村旅游地形象传播。开展旅游地形象宣传,以欠发达地区独有的生态自然景观以及文化内涵增强经济效益,为本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机会。以旅游资源为基础,旅游产品为主体,旅游市场为导向,旅游综合效益为重心,通过信息技术将旅游需求与供给互通,深化旅游者对旅游地形象感知,推动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 5.5 返贫风险防控协同监督机制

欠发达地区返贫风险防控重点在于其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因此,欠发达地区应建立返贫责任体系,并引入多元主体形成监督合力,同时贯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起区域一体化发展下内

外协同监督新格局。①建立返贫责任体系。欠发达地区在以往旅游扶贫中,旅游项目选择、运营和管理缺乏经验,实施多为周期短、见效快的旅游项目,应对旅游项目的选择和运营管理全过程构建立体化的责任考核体系。②鼓励多元主体监督。乡村旅游业关联度高、涉及面广,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的脱贫地区需要多元主体协作、合力推进,欠发达旅游地应尽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本地居民、权威媒体、游客、第三方机构等多元主体监督的防控治理新格局。③探索旅游区域协同监督。以乡村旅游地为基本单元,探索旅游片区联动返贫监督体系。欠发达地区旅游资源往往连片存在,以大别山区为例,区域内天柱山旅游区和天堂寨旅游区以优质旅游景点带动区域旅游产业点线串联连片发展。由于旅游区域内旅游资源通常具有同质性,谋求周边村域开展旅游战略合作,通过协同发展实现差异化,推进区域整体旅游发展能力上升。在防控返贫风险工作中,实现旅游片区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提升旅游片区文化和旅游市场一体化综合监督功能。

#### 5.6 返贫风险防控常态化治理机制

返贫风险具有动态性,常态化预警和治理是返贫风险防控的核心内容。因此,欠发达地区应从警度判断、警源分析、风险应对等重点环节构建常态化风险治理的循环运行机制,做到实时跟踪、常态监测、及时预警,遏制返贫现象发生。①警度判断。警度判断是指对脱贫家庭进行返贫风险测算,确定其返贫风险数值,并划分等级。欠发达乡村旅游地返贫风险总体可控,但非旅游参与型脱贫家庭与旅游参与型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有所差异,在不同家庭特征维度下风险状况也有所不同。②警源分析。警源分析是指对主要的返贫风险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并预判其可能造成返贫的严重程度,进而快速防范和控制返贫风险的发生。首先,进行警源识别,诱发返贫风险的警源因素为内生性和突变性两种类型。其次,进行警源防控等级排序,对其可能诱发风险的要素和事项的危害程度进行排列。③风险应对。返贫风险应对是针对各类旅游脱贫后选择相应的干预措施。首先,着重于长期性引导和培养脱贫农户内生动力,积累脱贫家庭的资

产禀赋。其次,警度等级不同,干预措施程度也有所不同,对于I、II类风险等级的脱贫家庭,着重于持续培养其内生动力;对于III、IV类风险等级的脱贫家庭,在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和物质帮扶同时,逐步提高其内生动力;对于V类风险等级的脱贫家庭,需要紧急采取物质帮扶措施。最后,不同脱贫家庭返贫风险警源及其等级不同,根据不同类型脱贫农户警源识别优先级进行影响因素识别,并评价该影响因素给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采取更为具体的干预措施。

## 6 结论与启示

### 6.1 结论

本文以天柱山旅游区的14个乡村为例,测度了欠发达地区农户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检验了返贫风险的致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欠发达地区旅游地的返贫风险长效防控机制,有机契合了国家防止返贫的战略需求,可为阻断返贫、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更加详细和具体的参考。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相比非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的返贫风险更低,更具脱贫稳定性,说明旅游业对于助脱贫防返贫的影响效果显著。返贫风险随旅游参与程度呈现U型先降后升的趋势,高参与度农户亦会因受旅游业自身脆弱性影响而导致返贫风险有所升高。

(2)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包括内生性和突变性两类,其作用程度存在差异性。健康冲击对返贫风险呈现高度正向影响作用,人力资本对返贫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返贫风险的负向影响程度较小。当旅游参与程度较低时,就业冲击对其返贫风险影响较高;而当旅游参与程度较高时,自然资本和公共卫生冲击对其返贫风险影响较高。

(3)脱贫农户的生计多样性和非认知能力对返贫风险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其中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又优于生计多样性。旅游地风险防控能力和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显著,风险防控能力的调节效应又优于资源禀赋;对于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而言,旅游参与程度越高,调节变量对返贫风险的

调节效应越显著。

(4)基于COSO-ERM框架构建目标管理、组织层级、风险要素返贫风险防控体系,以目标设定机制为导向,以综合管控机制为统筹,形成以常态化治理为核心,制度健全、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督为保障的返贫风险多维综合防控机制。

### 6.2 启示

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为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针对欠发达地区存在的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防控应立足于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地有着明显的产品生命周期规律性变化,延长成熟期或使生命周期再循环是乡村旅游地居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应鼓励脱贫农户参与旅游,保障旅游资本流向本地居民尤其是脱贫居民,发挥旅游扶贫的本质要求。

(2)旅游地返贫风险防控既要借助外部力量,更要激发内部力量。虽然乡村旅游地发展重心在相对贫困人口受益上,强调脱贫人口的精准返贫防控,但旅游产业是造血式扶贫,需要脱贫农户依靠自身能力从旅游发展中获取红利。实证发现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返贫风险;作为心理资本的非认知能力对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应以增强脱贫农户的内生性资本作为返贫风险防控的基本出发点。

(3)因地制宜,制定旅游地返贫风险防控管理办法。乡村旅游地既往贫困状态、旅游资源、交通区位、社会文化状况等均有所不同,导致其在发展旅游产业时所形成的旅游扶贫模式不同,最终形成乡村旅游地脱贫返贫情况差异化。因此,应该科学把握乡村旅游地发展差异性,制定合理的返贫风险防控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方法,构建科学的返贫风险防控管理机制。

本文基于返贫防控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研究案例。但当前乡村地区的返贫风险统计数据相对匮乏且难以获得,因而对于返贫风险的测度是基于当期的静态数据,未来应收集长时段的面板数据,对返贫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及更深层次的生成机理

2022年9月

进行探讨。同时,选取的影响因素以及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不可能在完全程度上对返贫风险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刻画,后续研究可对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进行合理扩充和延伸。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周国华,张汝娇,贺艳华,等.论乡村聚落优化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6):902-912. [Zhou G H, Zhang R J, He Y H, et al.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relative pover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902-912.]
- [2] 仲超,林闽钢.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4):112-120. [Zhong C, Lin M G. A study of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latively poor famil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20(4): 112-120.]
- [3]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3-07(02). [Xi J P.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Poverty Alleviation[N]. People's Daily, 2020-03-07(02).]
- [4] 韩磊,乔花芳,谢双玉,等.恩施州旅游扶贫村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J].资源科学,2019,41(2):381-393. [Han L, Qiao H F, Xie S Y, et al. The difference and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impact in Enshi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villages based on PCI[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2): 381-393.]
- [5] Mottiar Z.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area as a motivation for cooperation among rural tourism entrepreneurs[J]. Tourism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16, 13(2): 203-218.
- [6] Folarin O, Adeniyi O. Does tourism reduce poverty i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0, 59(1): 140-155.
- [7] 余利红.基于匹配倍差法的乡村旅游扶贫农户增收效应[J].资源科学,2019,41(5):955-966. [Yu L H. Effects of rural pro-poor tourism on farming households' income: A study based on the PSM-DID method[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5): 955-966.]
- [8] 李益敏,蒋睿.怒江大峡谷旅游扶贫研究[J].人文地理,2010,25(6):131-134. [Li Y M, Jiang R. A research on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Nujiang grand canyon[J]. Human Geography, 2010, 25(6): 131-134.]
- [9] 孙九霞,徐新建,王宁,等.旅游对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作用的途径与模式:“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专家笔谈[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10):2604-2614. [Sun J X, Xu X J, Wang N, et al. Ways and patterns of tourism's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pert discussion on "Tourism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0): 2604-2614.]
- [10] 陈超凡,王赞.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来自罗霄山片区的经验证据[J].经济地理,2020,40(1):226-233. [Chen C F, Wang Y. Tourism-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uoxiao Mountain are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 226-233.]
- [11] 徐少癸,方世巧,甘永萍,等.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21,30(2):367-377. [Xu S K, Fang S Q, Gan Y P, et al. Measurement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in Guangxi border ethnic areas[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1, 30(2): 367-377.]
- [12] 何静,汪侠,刘丹丽,等.国家级贫困县旅游发展与多维贫困的脱钩关系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9,38(5):1189-1207. [He J, Wang X, Liu D L, et al. 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national-level poor counties: A case study of Southwest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5): 1189-1207.]
- [13] 穆学青,郭向阳,明庆忠.多维贫困视角下县域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机理:以云南25个边境县(市)为例[J].经济地理,2020,40(12):199-210. [Mu X Q, Guo X Y, Ming Q Z.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mpact mechanism of county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25 border counties (cities) in Yun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2): 199-210.]
- [14] 谢双玉,李琳,冯娟,等.贫困与非贫困户旅游扶贫政策绩效感知差异研究:以恩施为例[J].旅游学刊,2020,35(2):80-92. [Xie S Y, Li L, Feng J, et al.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oor and non-poor households' perception o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performance in Enshi[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2): 80-92.]
- [15] 段伟,欧阳波.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J].资源科学,2020,42(6):1074-1086. [Duan W, Ouyang B. Impacts of protected areas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of surrounding rural households: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based on social capital[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6): 1074-1086.]
- [16] Kuypers S, Marx I. The truly vulnerable: Integrating wealth in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 effectivenes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9, 142(1): 131-147.
- [17] Atake E H. Health shocks in sub-Saharan Africa: Are the poor and uninsured households more vulnerable?[J]. Health Economics Review, 2018, 8(1): 1-13.

- [18] 罗玉杰, 李会琴, 侯林春, 等.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乡村旅游地返贫风险识别及预警机制构建: 以湖北省恩施州W村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2): 186-193. [Luo Y J, Li H Q, Hou L C, et al.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warning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poverty-return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6(2): 186-193.]
- [19] 黄金梓, 李燕凌. 突发环境事件与生态脆弱性地区返贫风险防控[J]. 江西社会科学, 2021, 41(4): 245-253. [Huang J Z, Li Y 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and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J].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21, 41(4): 245-253.]
- [20] 田里, 刘亮. 旅游驱动型区域返贫: 内涵、路径与阻断[J]. 湖湘论坛, 2021, 34(1): 86-92. [Tian L, Liu L. Tourism-driven reg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onnotation, path and interruption[J]. Huxiang Forum, 2021, 34(1): 86-92.]
- [21] 李壮壮, 龙莹. 新发展阶段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15-27. [Li Z Z, Long Y.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ural pover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1(2): 15-27.]
- [22] 吕华鲜. 壮族贫困户旅游脱贫参与障碍与对策: 基于广西河池市祥贝乡的调查分析[J]. 社会科学家, 2021, (1): 54-60. [Lv H X. Barrier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Zhuang's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Xiangbei Township, Hechi City, Guangxi Province[J]. Social Scientist, 2021, (1): 54-60.]
- [23] Chaudhuri S, Jalan J, Suryahadi A.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R].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0102-52, 2002.
- [24] 严小燕, 祁新华, 潘颖, 等. 贫困退出背景下返贫脆弱性评价: 融合区域与个体的新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2): 440-458. [Yan X Y, Qi X H, Pan Y, et al.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return-to-poverty under poverty elimination in China: A new integrated regional and individu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2): 440-458.]
- [25] 葛永波, 陈虹宇. 贫困脆弱性及其应对策略: 国外研究的新进展[J]. 国外理论动态, 2021, (2): 170-176. [Ge Y B, Chen H Y.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New advances in foreign research[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21, (2): 170-176.]
- [26] 周迪, 陈明成, 邱铭坚. 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 来自广东省相对贫困村的微观证据[J]. 财经研究, 2022, 48(8): 48-62. [Zhou D, Chen M C, Qiu M J.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groups emerging from poverty and risk of return-to-poverty: Micro evidence from relatively poor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2, 48(8): 48-62.]
- [27] 耿新. 民族地区返贫风险与返贫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5): 68-75. [Geng X. An analysis of risk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eople returning to povert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J].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37(5): 68-75.]
- [28] Novignon J, Nonvignon J, Mussa R, et al. Health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 Ghana: Evidence from the Ghana living standards survey round 5[J]. Health Economics Review, 2012, DOI: 10.1186/2191-1991-2-11.
- [29] Pritchett L, Suryahadi A, Sumarto S. Quantify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 proposed measure, applied to Indonesia[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0.
- [30] Levente B, Dumitru D D. Decentralized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ssues under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s[J]. Risks, 2021, 9(9): 1-18.
- [31] 黎洁, 高岚. 乡村旅游对农户农林业生产和外出务工影响研究: 基于陕西22个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J]. 人文地理, 2019, 34(4): 143-151. [Li J, Gao L.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rural households plantation and migration in the poor mountainous areas: Evidence from survey in 22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4): 143-151.]
- [32]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9.
- [33] 徐爽, 胡业翠.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分析: 以广西金桥村移民安置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 38(3): 142-148. [Xu S, Hu Y C.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alysis of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of farmers: A case study of the resettlement area of Jinqiao Village in Guangxi[J].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3): 142-148.]
- [34] 杨琨, 刘鹏飞. 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分析: 以兰州安宁区为例[J]. 水土保持研究, 2020, 27(4): 342-348. [Yang K, Liu P F.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n land-lost farmers'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 A case study of Anning District in Lanzhou[J]. 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20, 27(4): 342-348.]
- [35] 张晶, 孙鹏举, 刘学录, 等. 生计资本对黄土丘陵区贫困人口生计活动的影响及评价: 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11): 243-251. [Zhang J, Sun P J, Liu X L, et al.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livelihood activities of poor people in loess hilly region and its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of Yuzhong County, Gansu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0, 41(11): 243-251.]
- [36] Staub C G, Clarkson G. Farmer-led participatory extension leads Haitian farmers to anticipate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adjust livelihood strateg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1(1): 235-

2022年9月

- 245.
- [37] 杨新军, 石育中, 王子侨. 道路建设对秦岭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 一个社区恢复力的视角[J]. 地理学报, 2015, 70(8): 1313-1326. [Yang X J, Shi Y Z, Wang Z Q.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road construction on a loc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n Qinling mountainous area: A resilience perspectiv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8): 1313-1326.]
- [38] Bühler D, Sharma R, Stein W.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d earnings in Southeast Asia: The role of non-cognitive skills[J]. *Labour Economics*, 2020, 67(4): 1-23.
- [39] 张莎莎, 郑循刚. 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内生动力[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4): 44-53. [Zhang S S, Zheng X G. Endogenetic impetus on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0(4): 44-53.]
- [40] 李佳丽, 何瑞珠. 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青少年发展: 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阐释[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8): 97-105. [Li J L, He R Z. Family education time investment,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shadow education[J]. *China Youth Study*, 2019, (8): 97-105.]
- [41] Schurer S. Bouncing back from health shocks: Locus of control and labor supply[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7, 133(3): 1-20.
- [42] Musavengane R, Siakwah P, Leonard L. The nexus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 risk: Toward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outdoor tourism in African cities[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20, DOI: 10.1016/j.jort.2019.100254.
- [43] 韩增林, 潘佳玉, 郭建科, 等. 基于地理本性的滨海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分析[J]. 资源科学, 2022, 44(3): 634-645. [Han Z L, Pan J Y, Guo J K, et al. Tourism system adaptability analysis of coastal cities based on geographical natures[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3): 634-645.]
- [44] 任瑞, 李雪梅, 李兰海, 等. 中国天山山区降水形态转变的驱动因子辨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3): 112-117. [Ren R, Li X M, Li L H, et al. Discrimination of driving factors of precipitation forms in Tianshan mountains area of China[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3): 112-117.]
- [45] 杨定, 杨振山. 高寒地区生态贫困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色列林错地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21, 43(2): 293-303. [Yang D, Yang Z S. Ecological pover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n alpine area: Case study of the Selinco area[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2): 293-303.]
- [46] 郭之天, 陆汉文. 相对贫困的界定: 国际经验与启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4): 100-111. [Guo Z T, Lu H W. Defining relative povert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s[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20(4): 100-111.]
- [47] 刘郑伟, 付梅臣, 丁茜. 边境贸易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演变研究[J]. 资源科学, 2018, 40(4): 729-736. [Liu Z W, Fu M C, Ding Q. Driving force evolution of land use change in a border trade area of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18, 40(4): 729-736.]
- [48] 李根丽, 尤亮. 非认知能力对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的影响[J]. 财经研究, 2022, 48(3): 124-138. [Li G L, You L. The impact of non-cognitive skills on wages of informal workers[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2, 48(3): 124-138.]

# Risk and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HUANG Tai<sup>1,2</sup>, WEI Man<sup>1</sup>, XI Jianchao<sup>3</sup>

(1.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2. Academ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Research,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a key issue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fter tourism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Based on the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theory and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theory, this study took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used the Tianzhu Mountain tourism area in the Dabie Mountains as an example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its internal driving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underdevelope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the stabi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s generally high. Compared with non-tourism participating farmers, tourism participating farmers have higher stability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nd lower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But with the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from low to high,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shows a U-shaped change, that is, farmers with high participation can be affected by the vulnerability of tourism, which leads to a reverse increase in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Besid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include endogenous and sudden onset factor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armers with tourism participation, the effects of the two factors are also different. For tourism participating farmers, on the one hand, health impact and human capita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affect it through the divers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and non-cognitive ability reflecting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has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higher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bility and resource endowment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the lower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of farmers. Finally, underdeveloped tourism areas should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which takes targe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risk factors as the framework, goal setting,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normalized governance, system improvem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as one. This study can provide beneficial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Key words:** underdeveloped areas;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Tianzhu Mountain tourism area